

◀ （上接 13 版）

承认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, 将其非学科化, 但那只是哲学的存在方式, 就我们的研究方式而言, 难道最终还不是表现为文本? 正如绘画的最终成果是图画, 虽然画家也要读书; 摄影家的最终成果是照片, 虽然他们也要游山玩水; 哲学的最终成果必然是文本。而且, 你(也就是本文作者“我”)虽然在提倡真正的哲学, 可是, 还是需要以一篇文章的方式展现你的观点和思索。以文本化的方式主张非文本化, 你犯了语用学矛盾。就像你和小朋友玩躲猫猫, 问: “房间里有人么?” 小朋友天真地回答: “房间里没人。” 成人马上看出小朋友自相矛盾了。

目前所谓哲学主要是文本化的研究方式。然而我们要指出的是, 这里面存在着三种强度的文本化。

最强强度的文本化是无论研究对象还是表现形式都是文本。我们通常所见的哲学论文或者哲学著作, 虽然就其内涵而言也许离开哲学很远, 是一堆哲学黑话的堆砌, 除了作者和编辑, 没有更多的人阅读它们, 但它们的确展现了这种工作方式。无论其研究对象是《孟子》还是《理想国》, 总之是文本。而研究者仍然习惯于写出论文或者著作来表达其思考。

然而,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双重文本的工作方式所具有的内在差别。一种类型面对的是经典的哲学文本。比如《纯粹理性批判》《林中路》等等, 其作者本身就是毫无争议的哲学家; 一种类型是面对一般化的文本。从学科的角度看, 对这些文本的归属甚至存在争议。比如《文汇报》上的一篇散文, 也许是文学史的研究对象, 但是, 它显然也可以纳入哲学史的研究范围。对于后者我们目前的关注度还不够。

居中强度的文本化是面对所谓的生活世界, 但是其产生的结果仍然是文本。注意, 所谓生活世界, 并不只包括当代的、目前的, 也包括历史上的。换言之, 就是将人类的一切历史和现实都包括在内的世界。比如我读硕士研究生阶段曾经想对上海的石库门进行哲学研究, 虽然最终没有做成, 但就其对象而言, 已经不是通常所说的哲学文本, 甚至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本, 而是建筑。

但是, 这种工作方式仍然存在着文本化。不仅仅其结果是文本, 而且在工作的环节中, 仍然需要将非文本化的对象转化为文本。以石库门的哲学研究为例, 当时我的意图是从中

窥见上海文化中西交融的特征。显然, 我们还是需要用一套文本化的观念来刻画石库门。比如, 指出某个特征是传统的, 某个特征则是西式的, 等等。哲学研究即便在素材阶段, 还是需要大量依靠文本, 也就是记下很多笔记, 主要表现为文字的笔记。这点和以素描为组成部分的画画很不同。

还比如, 近期上海哲学界举办了两期以酒为主题的哲学讨论会。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哲学文本化研究方式的突破。翻检其论文, 大部分文章还是在讨论文本中的酒, 甚至经典哲学文本中的酒。比如, 有一个作者写了《孟子》中的酒, 思路新奇, 显示了其对《孟子》的高度熟悉。但是吊诡之处是, 以研究(经典)文本中的酒哲学为主题的论文大概是和酒本身的精神离开比较远的。

最弱强度的文本化工作方式是在研究对象、研究环节和研究结果三个组成部分上都尽量少地出现文本。但困难之处在于, 这种最低强度的文本化显然不符合今日哲学研究的要求, 越是成功做到这一点的, 越是难以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, 甚至越是不能被找到。

我们应该看到存在着如上三种哲学的工作方式。目前我们习惯于第一种, 尤其是以经典化文本为对象的研究方式。如果我们要开拓哲学研究的范围, 如果我们承认哲学绝不是学院内部的事情, 那么后两种工作方式乃至存在方式也需要注意并加以实践。说哲学的最高境界是不言之教, 也许过于高深, 也会压迫目前大多数哲学工作者的生存空间, 而且, 也会容纳许多欺世盗名者(因为离开了文本, 我们无疑更加难

以印证哲学的水准), 但无疑是值得主张和尝试的。因为那就是哲学。

这么说是不是在提倡蒙昧主义? 是不是和哲学是反思、哲学是理性的运用等等这些关于哲学的基本认识相矛盾? 也许当我们在说哲学是反思的同时, 还要说反思是实践。如果说完全主张哲学是无字之术是勉为其难, 我们只需知道有这么一种哲学方式就足够了, 那么我们至少要知道并牢记: 反思是实践。这绝不是将理论和实践相混淆, 而是说当我们在电脑上敲下这些哲学性的文字时, 我们以某种方式涉及了实践。文本化的哲学工作方式之所以是有意义的, 因为那只是实践的一种展开形式。

写作在实与思之间, 距离思更近。我所说的实主要指的是哲学研究应该面对现实。也就是在本部分所说的第二种或第三种强度的文本化所面对的现实。由于目前我们的哲学工作方式主要是第一种强度的文本化, 姑且认为反思也是某种实践。这与其说是某种权宜之说, 不如说是在更大的背景内赋予通常的文本化的哲学研究以合法性。

关于为什么哲学研究必须采取文本化的进路, 有一种思路并不否认现实作为问题的源泉的积极意义。但是, 这种思路认为, 现实给予的刺激必须学术化。而学术化对哲学而言主要是文本化, 否则我们的哲学研究就变成社会学调查了, 甚至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了。对此, 我们的疑惑是, 为什么对于现实问题的疑问必须通过回顾历史、特别是思想史、哲学史而获得解决? 孟子怎么说在修辞上可以丰富我们的回答, 但是

在逻辑上就犯了以权威为据的逻辑错误。如果说这种解答是一种论述策略, 目的是为了

避免和现实情势之间过于紧张, 是文人的雅兴或者自保措施, 那只能说这是某些学者自己的选择, 青菜萝卜各有所爱, 如此而已。不过, 当青菜太多, 萝卜就成了稀罕物。我的意思是说, 将现实刺激变得学术化, 文本化的处理方式过于频繁时, 将现实刺激直接以自身的思考“怼”过去, 倒是更加珍贵的。

哲学教育的目的应是实践

近期有两个事件的出现, 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一是有北大哲学系学者发表了关于哲学何为的论文, 并且被《新华文摘》转载。文章的基本意思是, 目前的哲学教育主要目的是培养专业学者, 而忽略了哲学的普及功能。哲学做得越好, 离开公众越远。这种情况使人疑惑: 这是好的哲学吗? (张志伟:《哲学学科的繁荣与哲学的危机》,《新华文摘》2018 年第 12 期)

另一件是网络上出现的毕业季各种恶搞。比如一个穿着研究生学位服的男生在路边摆摊, 标牌上写着: “哲学硕士, 精通德国哲学, 古希腊哲学, 分析哲学, 求包吃包住的工作。” 如果联系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, 这个场景显然意有所指。

有学者严肃地指出, 如果真的精通德国哲学、古希腊哲学或者分析哲学, 那么, 好工作多的是。但是一个硕士精通任何一种哲学都是困难的, 遑论数种。这显然是个编出来的段子, 因为并没有哲学硕士这种说法, 只有西方哲学硕士、中国哲学硕士等具体的名称。

也许我们可以推论出的一个疑问是, 没有精通任何一种门类哲学的哲学系硕士毕业生, 是否毕业即失业? 他的失业, 如果不考虑外在的因素, 究竟是学业太专一还是太“万精油”?

这是在说哲学教育的目的问题——显然太大。除却哲学是培养理想人格之类的老生常谈, 就现在我们讨论的具体内容来看, 不禁要问, 哲学教育究竟是培养直面现实的思考能力, 还是直面文本的分析能力?

如果笼统地回答是与非, 则与事实不符。也许我的答案比较悲观: 我们的哲学教育不仅逐渐丧失了培养学生文本分

析的能力, 而且, 也以低俗的、廉价的所谓阅读经典掩盖了培养直面现实能力的任务。

在史与思相结合的视野中, 哲学至少是阅读文本、分析文本的。然而, 在传统文化复兴热的背景下, 这个任务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。文本被局限为传统文化, 更被缩减为儒家文本(甚至是野路子的)。关于现代版《三字经》的争论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点——对《三字经》中若干不适合于今日的成分略作删改, 明明功莫大焉, 却被人污蔑为损害传统经典。事实上, 在史与思相结合的视野中, 史即便是哲学史, 也不是儒家一家所能规范。虽是常识, 今日仍有重申之必要。

黑格尔认为, 后起的哲学体系吸纳了前期的哲学体系。当我们回归儒家经典的时候, 须注意后世的思想史、哲学史对其展开的批评, 而不能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——理论预设和实践展开之间真正存在语用学矛盾了。

也有人认为, 提倡国学正是出于对现实问题的思索。他们认为, 现实存在问题, 比如道德衰退、传统文化不彰, 所以提倡国学。这里面包含了太多的问题, 不可能在此一一解答。但是, 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再创造来回应这些问题呢? 哲学的工作方式也许还是需要文本化, 但这些文本为什么不是我们自己撰写的呢?

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这个时代的文化。就中国而言,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的时代精神不可同日而语。除去两者内涵的不同, 有一点是共同的, 那就是它们都是当时的人们自己创造的。这才是真正的现实, 真正的哲学的对象。

因此, 哲学系毕业的学生的长处不在于他们学了很多哲学史的知识, 而在于他们被训练了能够直面现实的思考能力。这显然是一个人尽皆知的观点。所谓“授之以鱼, 不如授之以渔”。但是, 授之以渔本质上是手段, 目的还是鱼。只是直接给鱼, 无论多少年的教育都不够, 因此就教授了获得鱼的方法论。在史与思的视域下, 直面现实的任务反而被遗忘了。

当我看到我们的学生辈写着和我们的老师辈一样的哲学论文, 比如“《孟子》人性论研究”“《庄子》政治哲学研究”, 我就想起很久以前一位学者的比喻: 现在很多人在争论动车为什么不开, 却忘了自己正处于动车之上, 一日千里。

(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)



我们通常所见的哲学论文或者哲学著作, 虽然就其内涵而言也许离开哲学很远, 是一堆哲学黑话的堆砌, 除了作者和编辑, 没有更多的人阅读它们, 但它们的确展现了这种工作方式。